

一九一七年，教職員內部開始討論這項課程，並且同意開設這門課(但非強制要求)。然而，當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所有計畫都宣告停擺^⑦。艾爾斯金也前往歐洲協助教育美國士兵，哥倫比亞學院則在為戰爭作準備，經典名著課程自然被擱置一旁。一九一九年，艾爾斯金重返哥倫比亞學院，又開始鼓吹開設這門課，一九二〇年他獲准開課。雖然在最後幾年，艾爾斯金給人的印象似乎是，哥倫比亞學院的教職員蒙受其計畫所害者多，支持其計畫者少，但一九二〇年代教過這門課的專門講師皆表示，艾爾斯金其實沒這麼勢單力薄。「榮譽課程」開設的第一年，與艾爾斯金一起合作的有阿德勒(Mortimer J. Adler)、韋佛(Raymond M. Weaver)、奈夫(Emery E. Neff)、范多倫(Mark Van Doran)、史奈德(H. W. Schneider)、費迪曼(Clifton Fadiman)、艾德曼(Irwin Edman)、凱伊斯(C. W. Kayes)與布萊伯納(J. Bartlett Brebner)等人。

不論自何種角度觀之，這都是一份令人難忘的名單。阿德勒於一九二〇年代離開哥倫比亞學院到芝加哥大學教書，他根據「榮譽課程」的指導方針，改造芝加哥大學的課程，並終身支持經典名著課程^⑧。范多倫則留在哥倫比亞學院，完成他寫詩、寫散文、作學術研究又教書的生涯歷程。然而，若從更宏觀的哥倫比亞學院通識教育傳統

⑦ John Erskine, "General Honors at Columbia," in *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Its Curriculum: A Supplement to The New Republic* 32, no. 412, Part B(25 October 1922), p. 13.

⑧ 參照 Mortimer J. Adler, "Great Books, Democracy and Truth," in his *Reforming Education: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*, edited by Geraldine Van Doren (New York: Collier Books, 1988), pp. xix-xxxiii.

來看，這份名單又有不同的意義。名單上的許多教授，在他們講授「榮譽課程」時，都只是年輕的小夥子，後來都前程似錦，並於一九三〇年代協助開設「人文學科課程」。換言之，這些人不只在「榮譽課程」上，對通識教育有所貢獻。像是艾德曼與凱伊斯，就曾協助開設「當代文明課程」，歷史學教授布萊伯納也教了好幾年的「當代文明課程」。一九二〇年代的大半時間與一九三〇年代早期，經濟學家圖格威爾(Tugwell)都曾講授「當代文明課程」，直到經濟大恐慌時期，他才離開學校去擔任羅斯福(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)的「智囊團」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棘手問題(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)——何謂經典名著？這個棘手問題，最後成為一九一七年的主要阻礙。當這門課首次被提出時，哥倫比亞教學委員會(College's Committee on Instruction)並沒有達成確切的結論，反而傾向讓艾爾斯金自行研擬一份書單，然後再看看事情的發展。雖然艾爾斯金後來也承認，上過「榮譽課程」之後，他才比較容易界定何謂經典名著；一剛開始，對於該選什麼書，他其實只有初步的概念。他說：「經典名著是過去有意義、未來也仍有意義的書，就算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它依然對各種人都有意義」^⑨。不過，這不代表大家必須對特定作者的價值達成共識，因為「真正偉大的作家，會被不同的人、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而接受」^⑩。換句話說，艾爾斯金認為，經典名著之所以知名，是因為它的豐富性與模糊性；書本之所以重要，不只因為

^⑨ Erskine, *My Life as a Teacher*, p. 169.

^⑩ Ibid.

人們讀它(更不是因為人們同意它的說法)，而是因為人們通常不同意它——或至少不完全同意。

儘管研讀經典名著的構想，對哥倫比亞學院的影響最大，但它很快也流傳到其他學院與大學，其影響力甚至延續至今。艾爾斯金最初的書單，約有七十五本書，遍及古代至一八〇〇年。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，哥倫比亞學院修改了艾爾斯金的書單——芝加哥大學、聖母院、聖約翰學院等採行經典名著課程的學校，也修改過這份書單——但後來多數的經典名著課程，仍保留了艾爾斯金書單上約百分之八十五的書¹¹。在哥倫比亞學院，「榮譽課程」為期兩學年，學生每週閱讀一本書，並於每週三下午，在二十五至三十人的班級中討論這本書。每班各有兩名講師，講師負責鼓勵同學討論，他們則盡量少發言。「榮譽課程」就跟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一樣，也假設唯有透過討論(而非講座)，學生才能直接理解這些經典名著。

在「榮譽課程」中，經典名著並不侷限於文學文本，因為若這麼做，就表示我們唸書只在乎其文學價值，而不管它的宗教、哲學或科學內容。於是，學生閱讀荷馬、埃斯庫羅斯(Aeschylus)、但丁與莎士比亞，但他們也閱讀《聖經》、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、聖奧古斯丁(St. Augustine)與斯賓諾莎(Spinoza)。納入哲學家與神學家的這項做法，正好契合這門課的總體目標——培養出有教養的人，而非具有深厚文學背景的人。「榮譽課程」是為了解這些值得一讀再讀的經典名著；它等於是終身教育的起點。在這一點上，「榮譽課程」

¹¹ Adler, "Great Books, Democracy and Truth," pp. xx-xxi.

的觀念與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相當類似：「哥倫比亞學院的首要責任，就是幫助學生成為一個更加完整的人」^⑫。

然而，「榮譽課程」並未開放給所有學生。它甚至大刺刺地體現一種菁英主義，因為不是所有學生都能參加，只有那些通過特殊測驗、獲得推薦、或是有特殊學術表現的學生才能修習。巴契勒(Justus Buchler，一九五〇年代的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主席)發現，「榮譽課程」可能在哥倫比亞學院的學生內部形成一種「榮譽課程貴族」^⑬。反觀「當代文明課程」，它開放給所有就讀哥倫比亞學院的學生，但「榮譽課程」卻只是少數人佔據的機會。

艾爾斯金的「榮譽課程」已於一九二九年終止，哥倫比亞學院同年將「當代文明課程」延長為兩年的系列課程^⑭。然而，全體師生對經典名著課程的興趣依然不減，一九三二年，「榮譽課程」又再度復活，更名為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(Colloquium in Important Books)。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保留了「榮譽課程」的幾項特徵：小班制，僅招收面試合格的大三、大四學生，每週閱讀一本書，隨後參與週三傍晚的討論，討論會則由兩名講師主持。雖然艾爾斯金支

⑫ Justus Buchler, "Reconstruction in the Liberal Arts," in *A History of Columbia College on Morningside Heights*, edited by Dwight Miner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54), p. 115.

⑬ Ibid., p. 72.

⑭ 「榮譽課程」終止的原因不明。古特曼說得很模糊，只是說「各種原因與缺點導致教職員」終止這門課。參見 James Gutmann, "The Columbia College Colloquium," *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* 29(1937), p. 47. 在一九五四年，巴契勒(Justus Buchler)主張，「榮譽課程」之所以終止，是「因為它越來越不配合與哥倫比亞學院按部就班的組織方式」。參見 Buchler, "Reconstruction," p. 71.

持這門新課程，但他只負責舉薦三名資淺教職員來負責這門課的規劃工作，這三人分別為巴贊(Jacques Barzun)、古特曼(James Gutmann)與韋佛。新的書單則由布萊伯納負責研擬(範圍延伸到十九世紀的作品)。這項課程計畫需要花四個學期講授，分別探討特定歷史時期的作品——古代；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；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；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——唯有通過面試的大三、大四學生才能選修。

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就和「榮譽課程」一樣，也是「專門探討一些值得學生持續精讀的書籍」，並表達一種身為「有教養之業餘者的喜悅」¹⁵。不過，這門課也不開放給所有學生，主要是擔心學生的職涯準備會影響到課程規劃。在某些層面上，這門課呈現一種極為狹隘的學術精神：試圖為志為學者之人的深造之途作準備。誠如古特曼所觀察到的，「在哥倫比亞學院，如果一位優秀學生的知識興趣在於所謂的人文傳統思想，往往比志在其它領域的同學，還要難獲得同等的知識滿足」¹⁶。因此，這門課是為了提供專業學術訓練給未來攻讀文科的研究生，而非提供給所有同學。

總體說來，儘管在教員配置與科際內容上，「榮譽課程」、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與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三者十分類似，但前述兩者卻體現出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截然不同的理念。這兩門經典名著課程皆為高年級學生所設計，而非以全體新生為對象。這兩門課皆無法滿足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崇高目標：給予所有學生寶貴的生活資訊。相反地，「榮譽課程」與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皆試圖提供新的教育方法

¹⁵ Gutmann, "Columbia College Colloquium," pp. 49, 50.

¹⁶ Ibid., pp. 47, 48.

給中上程度的學生，正如艾德洛特(Frank Aydelotte)於一九二〇年代在史斯沃斯墨爾學院(Swarthmore College)所開的「榮譽課程」^{①⑦}。不過，之後為新生所開設的「人文學科課程」，並不會抹煞掉這些經典名著課程的益處。如今，哥倫比亞學院仍有開設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，但由於難以找到兩位講師連續講授兩年，所以開課機會並不多。

許多人都認為，缺乏大一、大二學生專屬的人文必修課程，可說是哥倫比亞學院課程的一大缺憾。雖然「當代文明課程」頗受歡迎，但它並沒有滿足哥倫比亞學院內部對通識教育的渴望，亦尚未抵銷狹隘應用課程與專業課程對課程的危害。一九三〇年，教育家佛萊斯納(Abraham Flexner，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待在師範學院)指出：「哥倫比亞學院的學生也許會認真研讀重要的科目，但學生也會修『廣告原理』、『廣告文案的撰寫』……『商業英文』、『基礎速記法』等較無人文氣息的課程」^{①⑧}。雖然佛萊斯納並非極具代表性的評論家，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，謀生的煩惱比任何對人文教育的堅持更能激勵學生。更確切地說，美國高等教育仍有著為職涯準備的需要，所以我們不能期待哥倫比亞學院的學生，在沒有獲得一些鼓勵的情況下，就懂得自行偏離這種行為模式^{①⑨}。

^{①⑦} 參照 Frank Aydelotte, "Swarthmore," in *Five College Plans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31), pp. 59-70.

^{①⑧} Abraham Flexner, *University: American, English, German*,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Clark Kerr (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30, 1968), p. 55.

^{①⑨} 對於此實際衝動的簡要分析，參照 Russell Jacoby, *Dogmatic Wisdom: How the Culture Wars Divert Education and Distract America* (New York: Doubleday, 1994), pp. 1-28.

艾爾斯金 (John Erskine '00)

艾爾斯金既是哥倫比亞學院的學生，畢業之後也在此任教，所以他與哥倫比亞學院牽扯了將近四十個年頭。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與「人文學科 A」皆源自艾爾斯金對「榮譽課程」的構想。雖然沒有教過新生的核心課程，但他對通識教育課程的影響力，並非侷限在哥倫比亞學院，還影響到全美的教育。

雖然他是個天才教師，但似乎欠缺傳統的學者性格。絢麗奪目、古怪、具文學抱負，這些使他有別於哥倫比亞學院中多數更為沉著穩重的同事。儘管他不具學術拘謹的性格，但這反而有助於其發展人文學科與個人意志。他在一九二〇年成功推行「榮譽課程」，這可說是二十世紀美國教育的重大事件。艾爾斯金最重要的一篇論文〈使自己具備理解與學習能力的道德義務〉(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)，標題就體現了他對「真教育」的期待，也將這種熱情灌輸給學生。

艾爾斯金一九〇〇年從哥倫比亞學院取得大學學位，一九〇一年取得碩士學位，一九〇三年取得博士學位。在艾摩斯特學院(Amherst College)教過英文之後，一九〇九年重返哥倫比亞學院，擔任文學教授，直到一九三七年才離開哥倫比亞學院(除了在第一次大戰期間，有短期到歐洲教育美國士兵)。艾爾斯金在二十一歲出版他第一本詩集，但在發表《特洛伊之海倫的私密生活》(*The Private Life of Helen of Troy*, 1925)之後，就結束了文學生涯。他也發表過許多重要的論文、評論以及兩大本的自傳。艾爾斯金同時也是技藝高超的作曲家與音樂家，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間，他擔任茱利亞音樂學院(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)的首位校長，同時也是大都會歌劇院協會(Metropolitan Opera Association)的主任，並撰述過幾本音樂書籍。

教職員大多認為，人文學科必修不但可以補充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社會科學導論，也能重申哥倫比亞學院對造「人」(而非造「商人」)的堅持。然而，哥倫比亞學院並沒有貿然推行第二大的核心課程。有關「人文學科課程」

的討論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，當時以艾德曼為首的委員會，已經完成委員的任命工作。隨後，兩個小組委員會（一個由范多倫主持，另一個由藍道爾主持）皆扮演重要的角色。誠如「當代文明課程」，「人文學科課程」也是審慎商議以及眾多教職員通力合作的結果^{②①}。

原計畫預計在兩年的個別課程中，提供文學、音樂與藝術等課程。艾德曼所領導的委員會在備忘錄中提到：「就『人文學科課程』來說，學生在大一、大二並無機會瞭解文學與藝術之間的相互關係，以及文學藝術與文明之間的關係（文學與藝術是文明的展現）」。於是，「人文學科課程」則以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為典範，「它是文學與藝術領域的專門課程（也包括哲學在內），『當代文明課程』則是社會科學的專門課程」^{②②}。

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，哥倫比亞學院開設新的「人文學科課程」，授課對象為大一與大二學生。課程名稱則平凡無奇。「人文學科 A」是所有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程，為期一年，涉及古代至十八世紀末的西方文學與哲學文本。「人文學科 B」是大二學生的選修課程，以西方的視覺藝術與音樂為主。一九四七年，「人文學科 B」變成必修，並更

②① 艾爾斯金對「人文學科課程」的影響充其量只是表面。「榮譽課程」早在「人文學科 A」開課的前幾年就已終止，艾爾斯金也只跟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的教職員交換過意見而已。他早在「人文學科 A」開設之前，就從哥倫比亞學院退休，追求他的文學生涯去了。雖然艾爾斯金的一些學生有影響到「人文學科 A」，但絕非艾爾斯金本人。

②② Memorandum Concerning Proposed Course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[1935], copy in John J. Coss Papers,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, Columbia University.

名為「藝術人文課程」與「音樂人文課程」。後來「人文學科 A」也更名為「文學人文課程」。不過，這都只是名稱上的改變，人文課程的基調仍延續至今。

然而，一九三七年，未來已變得不再確定。講師在實行這項新事業時，一直懷著既期待又擔憂的複雜心情。雖然講授「人文學科課程」的確很吸引人，但又擔心把如此複雜的資料丟給「不經挑選，或者說，毫無準備的新生」²²，會不會有什麼問題。此外，規劃這項課程所面臨的困難，也深深影響這門課的結果。一九三六年之後，哥倫比亞學院仍希望設計一門獨立的兩年制課程，專門講授古代至二十世紀的文化與藝術，但實際問題(尤其是音樂課程的部分)終究迫使哥倫比亞學院只執行一年就作罷。

「人文學科 A」作為系列必修課程(與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程)，一直受到最徹底的審視。事實上，它並不打算取代或恢復早期的「人文學科課程」，雖然它們之間有許多共通點。「人文學科 A」開課一年之後，巴贊(Jacques Barzun)發表支持這項新課程的四點聲明：「首先，學院授與學士學位，應該不只是為了替專業訓練鋪路，還應該試圖培養出有教養的人。其次，若所謂有教養的人意指具有夠豐富的內在生活，足以承受命運的矢石，那麼，學生欲成為這樣的人，就必須學著運用好書、圖畫與音樂來陶冶心靈。第三，記憶符號、標語與藝術書籍相關的二手判斷，對教育並無實質幫助。第四，若欲理解並熟悉書本，就必

²² Jacques Barzun, "Teaching the Humanities," *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* 30(1938), p. 196.

須花時間自行閱讀一遍」^{②③}。總體而言，「人文學科 A」主要將經典名著視為人文文本，而非文學、哲學或歷史課程的附屬品。這門課強調這些書「主要先討論人作為人，其次才是探討人作為哲學家、歷史學家或大學生」^{②④}。

這些設想結合了范阿姆凌吉與寇斯對人文教育的熱情，也融合了伍德貝瑞與艾爾斯金對人文與博聞的企望。誠如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創立者，「人文學科 A」的研擬者也承認，學院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為職涯作準備，所以他們就像伍德貝瑞或艾爾斯金一般，也致力於研讀經典名著，並認為這些名著是學生探討人類經驗的基礎。當然，也沒有人認為，「人文學科 A」能詳盡探究這些文本或滿足學生的需要。反之，套句英文系教授米洛羅(James Mirollo)的話，這門課的重點在於，「介紹給同學這些重要讀本，並幫助他們理解這些有影響力又能引發共鳴的書籍」^{②⑤}。

「人文學科 A」的研擬者也希望學生自己購買書籍，因為他們堅信：「有些書必須獨自閱讀，必須在舒適的情況下，端坐一段時間，時間長短取決於個人的慾望，而非速度。此外，當讀者讀到充斥各種思想的書籍時，必定會作記號、劃線且註記」^{②⑥}。然而，學生若欲趕上繁重的閱讀負荷，仍必須同時兼顧慾望與速度。

「人文學科 A」的書單應該歸功於哥倫比亞學院早期

^{②③} Ibid., p. 197.

^{②④} *A College Program in Action: A review of Working Principles at Columbia College*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46), p. 105.

^{②⑤} James Mirollo, "Happy Birthday, Humanity A," *Columbia*(April 1987), p. 34.

^{②⑥} *A College Program in Action*, p. 106

的「人文學科課程」，雖然「人文學科 A」的書目比較少，畢竟它是一年制的課程。「人文學科 A」也比以前的課程更強調希臘文與拉丁文經典，然而，這不是因為它增添了古典文本，而是因為它刪了一些近代的文本。舉例來說，秋季課程專門探討希臘與羅馬的文化遺產。學生從希臘文化的課程中，研習到史詩(《伊里亞特》)、戲劇〔埃斯庫羅斯(Aeschylus)、索福克里斯(Sophocles)、歐里庇德斯(Euripides)與阿里斯托芬(Aristophanes)〕與哲學(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)。學生也從羅馬文明的課程中，讀到盧克萊修(Lucretius)、維吉爾(Vergil)與奧勒利厄斯(Marcus Aurelius)。相較於秋季課程的從容不迫，春季課程卻快馬加鞭，火速上完一千五百年的歷史，從聖奧古斯丁的《懺悔錄》(*Confessions*)到歌德(Goethe)的《浮士德》(*Faust*)。

「人文學科 A」的課程大綱從不打算陳述一套固定的文本名單。更確切地說，由於「經典名著」一詞，給人一種武斷的感覺²⁷，所以哥倫比亞學院刻意不將「人文學科 A」描繪成一門「經典名著」課程。誠如哥倫比亞課程計畫委員會(College's Committee on Plans)所觀察到的，「說到何謂傳統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」²⁸。傳統的確不斷在改變。一九三八年，秋季課程的書單加入希羅多德(Herodotus)與修斯提底斯(Thucydides)的文選。遲至一九四〇年，秋季課程的書單才加上《聖經》(《約伯記》)，它是其中一本不屬於古希臘與古羅馬的文獻。一九四六年，泰西塔斯(Tacitus)取代奧勒利厄斯(Marcus Aurelius)。春季課程的書單也有改變。莎士

²⁷ Mirollo, "Happy Birthday," p. 34.

²⁸ *A College Program in Action*, p. 109.

比亞文選增加《暴風雨》(*The Tempest*)，卻刪除《第十二夜》(*The Twelfth Night*)與《馬克白》(*Macbeth*)；莫里哀(Molière)的選文則增加《太太學堂》(*School for Wives*)。「人文學科 A」的書單並非就此一成不變。盧森堡教授(John Rosenberg)最近還發現「人文學科 A」在一九三七年後所納入的一百五十本書，只有一些從未消失在書單上：如《伊里亞特》、《奧瑞斯特亞》(*Oresteia*)、《伊底帕斯王》(*Oedipus the King*)、但丁的《地獄》(*Inferno*)與《李爾王》(*King Lear*)²⁹。

「人文學科 A」不但要求學生每週讀一本書，還要求學生盡量念完整本書。哥倫比亞課程計畫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表示：「(『人文學科 A』)的每位教職員……皆認為，閱讀整本書比閱讀片段來得好」。「至於該選擇哪些片段，大家達成一個共識：篇幅長比篇幅短來得好」。迅速的閱讀速度以及沉重的閱讀量，都讓學生備感艱辛，畢竟這些學生才剛進大學。講師也認識到，他們必須協助學生學習如何閱讀。於是，學會完成作業的「成功技巧」也是「人文學科 A」帶給學生的寶貴經驗之一³⁰。然而也有跡象顯示，講師發現學生承受過多的期待；一九三八年春季之前，

²⁹ John D. Rosenberg, "The Imperiled Heart of the Core," *Columbia College Today* 20, no. 1 (Winter/Spring 1994), p. 18. 甚至這份書單也必須被刪減。最近，「文學人文課程」的大綱頂多只要求學生閱讀一部莎士比亞的作品，並不明確指定《李爾王》。

³⁰ *A College Program in Action*, pp. 109-10. 教導學生閱讀的重要性，仍然是哥倫比亞學院「人文學科課程」的特色。參照丹比(David Denby)如何評述他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重返「文學人文課程」的心得，"Does Homer Have Legs?" *The New Yorker* (8 October 1993)。Reprint in *The Best American Essays, 1994*,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racy Kidder (Boston & New York: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, 1994), pp. 57-84.

講師建議學生在聖誕節期間，開始閱讀《唐吉訶德》(*Don Quixote*)與《湯姆瓊斯》(*Tom Jones*)³¹。但在往後幾年，學生只讀《唐吉訶德》的第一部分，或是兩個部分都讀。

雖然「人文學科 A」承繼了「榮譽課程」與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對精讀以及討論重要文獻的堅持，但它卻是從「熱忱業餘者」的觀點出發。至於在組織與教員配置上，「人文學科 A」則仿效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做法。雖然這兩門課的課程大綱相去不遠，但「人文學科 A」的課程大綱又比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簡明許多，因為它每週只閱讀一本書。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，每班一週會面四次，一九四一年則減為一週三次(目前所有核心課程都是一週會面兩次，一次兩小時)。上下學期都有週考與四份報告要交。儘管哥倫比亞學院的資源吃緊，卻仍將班級人數控制在二十四名學生左右。「人文學科 A」開課第一年，只有二十班(如今則有五十三班)。每班只有一名講師，全年都是同一位。如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，「人文學科 A」也仰賴從各系所招募而來的教職員，這些教職員每週討論一次指定書單。

起初，那些提供「人文學科 A」講師的系所，也派講師給「當代文明課程」。講師選自英文系、哲學系、歷史系、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研究系、現代文學系。雖然往後幾年，「人文學科 A」與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教職員已逐漸區分開來，但哥倫比亞學院原是鼓勵教職員同時講授這兩門課程³²。哥倫比亞學院最著名的一些教授都同時講授過這兩門課，例如：歷史學家卡曼(Carman)、巴贊與布萊伯納

³¹ Mirollo, "Happy Birthday," p. 34.

³² Buchler, "Reconstruction," p. 116.

以及哲學家艾德曼。教職員能如此目標一致，一點也不令人意外，因為他們都普遍接受這兩門課的共同目標。在實際層面上，這兩門課都是哥倫比亞學院眾多系所課程的前奏。此外，這些概論課程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指導，它們還基於一個更遠大的目標——提供新生終身受用的思想與資訊。

古特曼(James Gutmann '18)

一九一八年，古特曼畢業於哥倫比亞學院。如果他再晚一年畢業，就能成為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學生。不過，古特曼身為老師，他一直都與哥倫比亞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密切相關。在哥倫比亞學院漫長的教學生涯中，他一直都在講授「當代文明課程」與「人文學科課程」。

在擔任哲學系教授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，他最著名的是德國理想主義的研究，尤其是康德的思想。一九二〇年代早期，古特曼成為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教職員。寇斯(John Coss)不久就發現古特曼是位優秀的老師〔此外還有巴贊與麥納(Dwight Miner)兩人〕。一九三二年，當哥倫比亞學院決定恢復艾爾斯金的「榮譽課程」，並更名為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時，古特曼就接下了新課程的主席一職。當哥倫比亞學院在一九三七年規定所有新生都必須修「人文學科A」時，古特曼也是第一批老師，並一直教到他退休為止。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五〇年間，他接下范多倫的「人文學科A」主席一職，並於一九五〇年代擔任哲學系系主任。

同事稱讚古特曼擔任「人文學科A」主席時的作為，說他「冷靜且運用奇特的管理手腕，挺過『人文學科A』的爭議期，不讓閒言閒語戰勝學習」。多數學生則忘不了他的教學能力。一九六二年，他還獲得畢業生所票選的最佳教師獎。即便退休之後，古特曼仍以「大學專題研討班」(University Seminar)主任之身分，持續支持哥倫比亞學院的通識教育。

第三章

「我們當代情境的複雜性」

哥倫比亞學院之所以願意全心投入大一的「人文學科課程」，一部分是因為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成就遠遠超過多數樂觀支持者的預期。一九一九年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雖在未知成敗的氣氛中展開，但整個一九二〇年代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卻逐漸成長茁壯，並定期微調課程大綱與書單。「當代文明課程」還成為哥倫比亞教育中最受歡迎且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以致於人們認為它存來已久。一九二八年春天，教職員徹底檢討大學教育，當時艾爾斯金(Erskine)的「榮譽學程」並沒有通過這項考驗，但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不僅通過仔細的檢驗，還獲得進一步的發展。一九二八年九月，新生修習當代文明概論的時間延長(延續到大二)，課程也更加細緻。

雖然這項決定會讓未來新生的社會科學必修增加一倍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當時學校並無理由擴充「當代文明課程」。教職員指出一年制「當代文明課程」所遇到的難題。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規劃者在第八版的課程大綱中(一九三〇年)指出，「我們當代情境的複雜性，導致哥倫比亞

學院發展出兩門社會研究概論課程」^①。卡曼(Harry Carman)與泰勒(Horace Taylor)是課程計畫的負責人，他們在一九三九年評論道：「(這門課的)規模與內容皆十分廣博，若只用一年的時間講授，不論從學生或從教職員的觀點來看，都無法令人完全滿意」^②。

新系列課程仍然延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以往的目標，但腳步卻從容許多。在新的規畫中，大一就專心考察西元一二〇〇年至今的西方文明史，而大一課程的正式名稱一直都是「當代西方文明概論」(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)，雖然它是以「當代文明 A」聞名。儘管這儼然是一門當代問題概論(敘述當代的背景，而非對當代進行全面的考察)，但它仍然沒有拋卻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一開始所苦心鑽研的三個問題：人如何生活？人如何生活在一起？人如何瞭解他們的世界？大二課程則聚焦在二十世紀的美國，名為「美國當代問題概論」(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)，也就是著名的「當代文明 B」，它不是什麼新課程，也沒有納入新的資料，僅擴充「當代文明課程」原先所處理的議題而已。這三個問題仍是大二課程的重心，只是「當代文明 B」顯然著重於「人如何生

① *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: A Syllabus*, 修訂過，由哥倫比亞學院經濟系、政府與國際公法系、歷史系與哲學系的同仁共同籌備而成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, 1930), p. 1.

② Harry J. Carman and Horace Taylor, "The Two-Year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," in *Columbia College Education: The Plan of the First Two years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[1939]), p. 13.

活」這個課題^③。

大二課程之所以著重在這個課題，一部分導因於投入其中的系所。哲學系與歷史系放棄它們的大一必修課程，專心設計早期的「當代文明課程」(即大一的「當代文明課程」)，政府管理系與經濟系也放棄它們的基礎課程(有眾多學生選修，但非必修)，專心設計大二的「當代文明課程」。大一課程以歷史與哲學為主，大二則以政府與經濟為主，但「當代文明B」卻不被想像成(也不曾變成)政治理論或經濟理論的基礎課程。在很大程度上，由於大一課程把注意力放在歐洲，所以大二課程主要(而非僅)聚焦於美國^④。

然而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若欲轉變成兩年制的課程，尚得做出許多改變。一九二八年初，「當代文明A」從原本的一週會面五次，改爲一週會面四次。一九二九年九月，剛開設的「當代文明B」一週會面三小時。最重要的轉變，也許是發生在課程的指定書單上。就「當代文明A」的文本選擇來說，仍和前幾年相去不遠。一方面，學生不再需要購買艾德曼(Irwin Edman)的《人性及其社會意義》(*Human Traits and Their Social Significance*)，另一方面，藍道爾(J. H. Randall)的《現代心智的形成》(*Making of the*

③ John J. Coss, "A Report of the Columbia Experiment with the Course on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," *The Junior College Curriculum*, edited by Williams S. Gray (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for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of Higher Institutions, Volume 1)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29), p. 139.

④ Justus Buchler, "Reconstruction in the Liberal Arts," in *A History of Columbia College on Morningside Heights*, edited by Dwight Miner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54), p. 105.

Modern Mind, 1926)反而躍升為更重要(且受歡迎)的課本。此外,「當代文明 A」主要從其他二十部文本中挑選讀本,哥倫比亞學院研習課程(Columbia Study,現已不復存在)仍保留這些文選^⑤。

然而,若欲設計兩年制的系列課程,確實必須大幅修改課程大綱,雖然這份大綱已修了六次。一九二八年秋季,完成了第七版的課程大綱,但只涵蓋第一年的系列課程^⑥。第七版雖在組織結構上仿照前面幾版,但內容卻更加詳細,並降低當代議題的比重。這種修正工作,需要借重許多講師的力量。除了卡曼與寇斯(他們從「當代文明課程」草創之初就參與其中)之外,其他幾個系所的講師也貢獻良多,如:史托克(John Storck,哲學系)、圖格威爾(Rexford G. Tugwell,經濟系)、史奈德(H. W. Schneider,歷史系)與麥納(Dwight Miner,歷史系)等人。藍道爾、史托克與圖格威爾的著作,皆被「當代文明課程」所採用;史奈德與麥納(之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計畫的主席)在他們的教學生涯中,多數時間都與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緊密相連。

然而,這份修訂過的課程大綱之所以重要,因為它標誌著「培養讀者運動」的興起,雖然好些年來,大綱的修改並非盡善盡美,像前幾版的課程大綱都很冗長,內容卻只有必讀書單而已。反觀第七版的課程大綱,它首次納入地圖、圖表與插圖。如寇斯(Coss)所言:「我們寫了許多章節,並

^⑤ Coss, "Columbia Experiment," p. 139.

^⑥ *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: A Syllabus*, 完全修訂過,由哥倫比亞學院經濟系、政府與國際公法系、歷史系與哲學系的同仁共同籌備而成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, 1928)。

將它們印成大綱的一部分，目標是簡潔、清晰且切中要點」。「未來我們可能撰寫符合我們需要的文本，它們必然優於以往所印製的任何資料」^⑦。

我們也不能忽視第七版的另一項創新。它最後是以一篇探討西方藝術的論文作結，內有黑白插圖，文章是由哥倫比亞學院年輕的藝術史學家夏皮羅(Meyer Schapiro)所寫。雖然藝術研究往往是兩年制「人文學科課程」的一部分，但我們必須謹記一點，當初美術被納入核心課程時，其實是作為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一部分。

這份修訂後的課程大綱，本身還經歷一次又一次的修正。像第七版的幾頁增刊，也趕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印製完成，第八版的課程大綱則趕在一九三〇學年度前完成。第八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圖表、地圖與插圖，且仍保留藝術的章節。不過，第八版最重要的一項創新在於，它特別重視原著——目前則是以專文的形式出現，剩下的篇幅主要是刊登文本。然而，第八版的作者群卻堅決主張，就其根本目的來說，第八版「跟第七版其實沒有什麼重大差別」^⑧。

「當代文明 B」目的是為了讓「學生實際瞭解它們自身的社會秩序，如此一來，學生便能在兼具能力與機會之下，理解社會秩序脈動並參與管理」^⑨。「當代文明 B」著重於二十世紀的美國政治經濟，此外，它也特別關切現

^⑦ Coss, "Columbia Experiment," p. 138-9.

^⑧ 前言附註，*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: A Syllabus*，第八版，修訂過。

^⑨ John J. Coss, "The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Course in Columbia College," *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* 24(1932), p. 439.

代工業興起的相關問題。寇斯說道：「本計畫試圖解釋一些正在美國運行的政經制度，並說明……在維持讓所有公民滿意的生活水準時……所遭遇的一些問題」^⑩。

因此，我們很難在講授「當代文明 B」的第一年，將它分門別類，因為這門課所考慮的面向很廣。回想起這門課規劃之初，美國經濟仍在成長，重工業日益重要，新的金融形式也越來越普及。「當代文明 B」正是要研討此一健全經濟體所引發的問題，諸如：製造過程、商品銷售與經銷、受工業化影響的企業與社經團體、銀行體系與現代工業的國際面向。這門課也分析政府機構在經濟體中所扮演的角色、政府的成本與功能、法律在現代社會的大致角色^⑪。最後，這門課再考察二十世紀初對現代工業的回應。

「當代文明 B」始於一九二九年秋季，其課程大綱已三年沒修。問題當然出在經濟，「當代文明 B」的研究對象一直在快速變動，開課後的一個月，紐約股票市場隨即瓦解，接著就是大蕭條(Great Depression)的來臨，這些事件都讓「當代文明 B」變得無關緊要。一九三二年，寇斯回顧「當代文明 B」的課程大綱，承認「我們並沒有通盤瞭解到，安全感在我們經濟體制中的重要性。如今我們想知道，如何隨時為所有這些群體謀取更大的安全感」^⑫。一切就宛如創立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一九一九年，目前的一些迫切問題，也促使哥倫比亞學院改革課程。在一份私

^⑩ 寇斯給霍克斯的信，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，寇斯報告，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, Columbia University.

^⑪ Coss, "Columbia Experiment," pp. 139-40.

^⑫ Coss, "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Course in Columbia College," p. 439.

人信件中，寇斯對霍克斯(Hawkes)說道：「學生與教職員等人，都認為情況有所改變，因此我們不應該試圖重建過時的計畫，反而要遵照它的根本目標，重新建構一套課程」¹³。

一九三二年秋天所執行的新計畫，其所涵蓋的主題和「當代文明 B」的首次嘗試大致雷同，只是當時整學年都圍繞在經濟安全的議題。第一學期先探討那些會影響經濟安全制度(銀行業、產業組織、國際事務)，以及特別容易遭受經濟安全問題所擾的群體(農夫、工薪階級)。春季學期則轉而研討經濟不穩定的解決之道，尤其是政府的角色。秋季學期則比較美國與其他國家促進經濟安全的方法，包括：法西斯主義、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國家¹⁴。大二課程仍試圖實現最初的目標——讓學生熟悉劇烈改變的經濟與世界。

在多數層面上，「當代文明 B」的教學組織工作皆仿效「當代文明 A」。教職員分別來自好幾個系所(不只是經濟系與政府管理系)，每週還有固定的會談。學生則可以拿到這門課專屬的課程大綱：從經濟統計資料到特定議題的學術文章，都是適合這門課的一手資料(新的課程計畫則先比較一九一四年、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二年之間的經濟狀況)。由於沒有一本書能完全達到「當代文明 B」的要求，所以從一開始，教職員就先因應學生的需要，收集大量的資料，沒用到的就擱置一旁。自一九三〇年起，「當代文明 B」規定學生實地考察一些重要的企業與政府機

¹³ 寇斯給霍克斯的信，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，寇斯報告。

¹⁴ 有關「當代文明課程 B2」的簡介，ms., Coss Papers; 也參見 Carman and Taylor, "Two-Year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," pp.14-15.

構。這些實地考察不但被視為這門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教學委員會(Committee on Instruction)甚至還發出警告：「學生若不參加『當代文明 B』所規定的實地考察，將無法獲得完整的成績，除非他們完成這項要求」^⑮。

卡曼(Harry J. Carman '21)

卡曼教許多人想起哥倫比亞學院院長一職，但他其實從一九二〇年代起，就對哥倫比亞學院造成重要的影響，這點經常遭人忽略。卡曼被形容成「他那一代最受歡迎且最知名的教師之一」，他是歷史系的支柱、「當代文明課程」堅定不移的支持者，同時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內部，堅決擁護哥倫比亞學院的人。

約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，卡曼從哥倫比亞學院畢業幾年之後，就成為「當代文明課程」背後的影響力量，當寇斯因病放棄教學，卡曼隨後就接任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主席一職。他擔任這個職務時，展現出傑出的管理技巧，因此，一九四三年霍克斯(Herbert Hawkes)去世之後，他順理成章成為哥倫比亞學院院長的不二人選。卡曼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，也是美國農業與農村史的權威。即使身為全職的哥倫比亞學院管理人員，他仍在紐約州北部經營一座勞動農場，並自詡為「絕佳的自耕農，絕不放棄薩拉托加市(Saratoga County)」。

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，卡曼對學生的奉獻格外出名，他還鼓勵年輕的巴贊(Jacques Barzun)朝學術之路邁進。麥納(Dwight Miner)把卡曼形容為「年輕人的朋友與諮詢師」，路人也多次聽到，卡曼在研討班稱讚「他那一群了不起的同事」。他有時還慷慨解囊，給予窮學生一些生活費。

當卡曼高齡六十五歲時，他不得不辭去哥倫比亞學院院長一職，但爾後仍活躍於哥倫比亞大學與公民事務上。此外，他還回哥倫比亞學院教了三年的歷史課，並擔任紐約市教育委員會(New York City Board of Education)的委員。

^⑮ 霍克斯給寇斯的信，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，寇斯報告。

「當代文明 B」開設不到幾年，又進行徹底的修正，但這其實只是在維持一種熟悉的模式。因為哥倫比亞學院把「當代文明 B」當成一種試驗，所以才毫不猶豫地修改它。儘管哥倫比亞學院宣稱，「當代文明 A」與「當代文明 B」是單一系列課程的兩個部分，但從一剛開始，這兩門課就沿著不同的路徑發展。對「當代文明 A」來說，一九二八年有一項根本的改變，當時教職員決議，「當代文明 A」主要聚焦於過去，到了一九四一年，教職員又決議，「當代文明 A」必讀一手資料。反觀「當代文明 B」，它則從未達成這種穩定性。整個一九三〇年代，即使是那些對「當代文明 B」擁護不已的人，也認為它遇到「最大的危機——缺乏一致性」¹⁶。

以下這則小醜聞，正顯示出「當代文明 B」在教學上以及一九三〇年代所考量的各種議題上所遭遇的雙重問題。一九三二年的一批讀物，收錄李德(Ruth Reed)《現代家庭》一書的一小部分(約三十頁)，李德是霍約克山學院(Mount Holyoke College)的教授。雖然這本書的實際內容，經證實大致與後來的爭論無關，但作者的確說到「目前的家庭形式並不完善」，且支持「建構新的婚姻形式以及非傳統的兩性婚姻，男女雙方皆有類似的背景與品味」¹⁷。這種言論在一九三二年頗駭人聽聞，而它之所

¹⁶ Carmen and Taylor, "Two-Year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," p. 14.

¹⁷ 引自 David A. Kaufman, "The Building of a Tradition: A History of Columbia College's Core Curriculum." 未出版的論文。Columbia University, 1990, p. 67. 有關此一爭議更詳細的敘述，參見 Kaufman, pp. 67-70, 但我並不完全仰賴他的描述。哥倫比亞學

以被納入課程大綱，正因為這樣的論點會激發同學的熱烈討論¹⁸。

然而，如果《觀察者》沒有刊載一篇類似的仿作，可能也不會有任何醜聞，而這篇仿作，隨後還被幾家紐約日報與國家新聞通訊社引用。觀照整起事件，原來是一門想削弱婚姻與家庭基礎的課程，納入一篇批評傳統婚姻與家庭的著作。不久，四處都報導了哥倫比亞學院的婚姻課程。《費城紀錄》(*Philadelphia Record*)下了一個閃亮的標題——「哥倫比亞學院提出婚姻的替代方案」。合眾新聞通訊社(United Press)的一篇報導則指出：「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課程是所有大學生的必修，它告誡學生應該消除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差異」¹⁹。其他報紙就沒有這麼含蓄了，反而宣稱這門課是在提倡自由戀愛與摧毀婚姻。

哥倫比亞學院隨後收到雪片般的來信。校長巴特勒、院長霍克斯與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主席寇斯等人，都收到無數信件，信中譴責哥倫比亞學院藐視我們現行所謂的傳統家庭價值。不少憂心忡忡的校友向學校索取課程大綱；一

院內部以及它與外界之間，皆具有大量的相似性，這在寇斯報告(Coss Paper)有提到。

¹⁸ 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一直有個傳統，就是採用一些怪異或極端的人作為教材。一九九〇年代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經常使用希特勒的《我的奮鬥》(*Mein Kampf*)一書。《當代文明文摘》(*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Reader*, New York: American Heritage Custom Publishing, 1994)還在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間，提供學生邊沁(Jeremy Bentham)的論文〈雞姦〉(*Paederasty*)，這篇文章在刊載之初十分轟動，至今仍可能令某些人驚愕不已。

¹⁹ “Substitutes for Marriage Advised in Columbia College,” *Philadelphia Record* 19 February 1932.

些保守的基督徒則為哥倫比亞學院的全體靈魂祈禱；一些女家長則撰寫文章讚美婚姻與母職的美德。在哥倫比亞大學內部，校長巴特勒責罵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主席寇斯。巴特勒說，雖然教師有權講授他自認為重要的事物，但有些議題太具爭議性，因此不能納入大學課程中。教育理事委員會(The Board of Trustees' Committee on Education)也關切這篇引發眾多負面報導的選文。

寇斯不厭其煩地回覆桌上的信件，但這些回覆聽起來都千篇一律——「別相信你在報紙所看到的任何事」——但他毫不猶豫地指出，李德對婚姻的批判並不代表哥倫比亞學院的政策。他也提到，美國家庭不會因為這六篇有關婚姻的選文而岌岌可危，畢竟這些文章只花兩天的時間討論，而這門課其實整整有兩年之久。巴特勒應該也不至於糊塗到大驚小怪的地步，於是，寇斯向巴特勒提出自己對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深刻理解，這份體悟至今仍適用。「任何熟悉指定讀物的學生都知道，除了老師所支持的觀點之外，任何讀物所表達的看法也代表一種觀點」，寇斯說道：「難道要等到我們都同意有一套文本，我們每個人對此都難以發表意見時，我們才應該指定讀物嗎？」^{②0}寇斯也跟理事委員會再三保證，引起爭議的選文並不代表「教職員所提倡的政策」，但一方面他也指出，「這些看法的流通，能夠確保它們以一種涉及學生親職責任的觀點表達出來」^{②1}。然而，寇斯也承認，這種

^{②0} 寇斯寫給巴特勒的信，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，寇斯報告。

^{②1} Coss, "The Discussion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," ms., Coss Papers.

醜聞對誰都沒有好處，並告知理事委員會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教職員決定在下次開課之前，重新修改這部分的選文。

此外，許多說法皆表示，現代婚姻爭議只不過是成功試驗中的小小脫軌(甚或是相當有趣的脫軌)。如今，哥倫比亞學院對通識教育已有新的使命，教職員也協助將此一理念散播到全美各大學。一九二七年，阿德勒〔(Mortimer Adler)曾與范多倫共同講授艾爾斯金的「榮譽學程」〕將「重要讀物研討班」引進芝加哥大學。其後，范多倫還協助阿德勒設計聖約翰學院(St. John College)的重要讀物研討班。其他學校僅自行採用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模式，並沒有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，例如：達特莫斯學院(Dartmouth College)與李德學院(Reed College)仿效哥倫比亞學院，引進「當代文明課程」，另有三十所以上的學校，也模仿哥倫比亞學院與李德學院的模式²²。

某些學校則非止於單純的模仿。美國海岸防衛隊官校(The Coast Guard Academy)不僅採用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課程大綱，還採用其考試模式。哥倫比亞學院有時會支持這種趨勢，例如，它贊助布魯克林的塞斯羅中學(Seth Low Junior College)採行「當代文明課程」。雖然哥倫比亞學院也樂意分享它的資料，但當它發現，其他學校欣然接受本校的基礎課程時(幾乎沒什麼修改，甚至擴及夏威夷與開羅等地的學校)，總是有點驚訝²³。

²² Ernest L. Boyer, *College: The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 in America* (New York: Harper & Row, 1987), p. 65.

²³ 寇斯認為「每所學院都應該善用任何可得的資料，但也應該自行設計課程大綱」。Coss, "Columbia Experiment," p. 141.

在哥倫比亞學院，核心課程——往往被描述成「基礎」、「基本」或「概論」課程——迅速成為大學經驗的印記，但不是所有人都樂見這些發展。像教育家費莎(Mowat Fraser)就在一九三七年批評美國的學院教育(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印製出版)，指出「當代文明課程」乃「一種概論課程……它所提出的公民議題與個人議題，想必對整個文明都很重要」，但他也堅決主張，這類課程並不明智，因為它「著實妨礙了紮實的、甚或是迅速有效的學習」，而這「必然導致不完整、不確定、短暫、甚或耗時的結果」²⁴。然而，哥倫比亞學院並沒有人想走回頭路。於是，就在費莎批評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那一年，哥倫比亞學院也開始推行「人文學科課程」。

雖然教學問題(尤其是音樂)粉碎了一九三〇年代大家對兩年制「人文學科課程」的期待，但哥倫比亞學院仍想替大一、大二學生設計音樂與美術必修課程。只不過，這項進展十分緩慢，因為這等於在探索「人文學科B」的新領域。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美術教學經驗，雖然能提供一些基礎，但要為幾乎沒音樂基礎的學生介紹西方音樂，根本沒有前例可循。音樂系助理教授摩爾(Douglas Moore)發現，「在某種程度上，音樂就像一種外語，在沒有特殊訓練之下，人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」。「不論是從美學、歷史或技巧上探討音樂，任何人可能都無法從中獲益，除非之前實際聽過這些音樂……且印象強

²⁴ Mowat G. Fraser, *The College of the Future: An Appraisal of Fundamental Plans and Trend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37), pp. 320-21.

烈到，足以對課堂所討論的作品有一定的概念」²⁵。不少人都意識到這個問題，所以幾乎沒有人相信，學生從「人文學科 B」獲得的益處，會等同於「當代文明課程」或「人文學科 A」帶給他們的收穫。

「人文學科 B」最大的挑戰在於，它從來不是以文本爲主的課程。對「人文學科 B」來說，文本一點都不重要，反而只是次要的，它只是用來輔助學生理解非文學的傑作。這門課強調一種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。「人文學科 B」試圖讓學生認識一些重要的音樂與美術作品，並教導學生一種新的能力，這種能力在哥倫比亞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十分罕見。學生必須學會經由非言語的媒介，明確表達他們對藝術作品的感受。「人文學科 B」的教材特殊，必然有不同的討論方式，因為學生無法指出某個頁數或某個日期，來加強他們的印象。以上這些都是耗時費力的目標，而哥倫比亞學院正試圖審慎地實踐這些目標。

由於難以探討美術與音樂作品，教職員於是以嶄新的方式處置「人文學科 B」。其中一個重大差異在於，「人文學科 B」並非一門必修，因為教職員對未來的結果似乎沒有把握²⁶。此外，教室外的體驗——出席音樂會與參觀博物館——當然對這門課十分重要，而不只是有趣或有用的課業輔助而已。然而，最重大的差異在於，「人文學科 B」一年約有十場講座，目的是爲了讓學生熟悉藝術

²⁵ Douglas Moore, "The Two-Year Course in the Humanities: The Second Year," *Columbia College Education: The Plan of The First Two Years*, p. 33.

²⁶ Buchler, "Reconstruction," p. 119

與音樂的研究。於是，講師所扮演的角色就變得更加重要。一方面教職員堅決主張，講座課程是必要的，這是出自教材的緣故。另一方面他們也清楚，這些講座不可能吸引每位同學。更確切地說，「該如何強迫不感興趣的學生參加講座」這個問題，就是起初不把「人文學科 B」列為必修的原因之一²⁷。

「人文學科 B」在開課後的幾年間，一直都是單一課程，它同時探討美術與音樂，一週會面兩次，講座與討論相互交替。不過，這門課卻不曾結合成一個整體，主要的原因在於講座。講座雖能提升學生的歷史理解，卻犧牲掉學生討論與分析的機會。一九四一年，教職員將「人文學科 B」一分為二——其一是音樂課（「人文學科 B1」），其二是美術課（「人文學科 B2」）。這兩門課的會面次數皆為每週三次，其中包括一場大型講座與兩場小組討論會²⁸。

不過幾經證實，光是這種方法仍然不夠。一九四六年，「人文學科 B1」與「人文學科 B2」採用「人文學科 A」與「當代文明課程」的成功模式，廢除每週的講座，將所有課堂時間都花在討論上。這項決議不僅重申這門課的方法，也再次確認其他核心課程的目標，尤其是「人文學科 A」。學生仍須出席音樂會，並親自參觀藝術作品，換言之，他們再也不能躲在講座背後理解這些作品了。厄普約翰教授(Everard M. Upjohn)身為藝術課程的首位負責人，他

²⁷ Moore, "Second Year," p. 35.

²⁸ 許多年來，經常有人建議「當代文明課程」與「人文科學 A」採取這類作法，但都被教職員所婉拒。

觀察到：「拓展學生的眼界乃當務之急，我們必須強迫他們親自考察建築、繪畫與雕塑本身，就如同他們在『人文學科 A』親自閱讀書本一般」²⁹。一九四七年，「人文學科 B1」與「人文學科 B2」都變成必修，這表示教學問題已經克服，這兩門課終究走出自己的風格，「人文學科課程」還把這些風格延續至今。

范多倫 (Mark Van Doren)

哥倫比亞學院有不少傑出的教師，但卻沒有人比范多倫還要出眾。全美國都知道他是一位小說家、劇作家、評論家、編輯兼詩人(他的《詩集》在一九四〇年獲得普立茲獎)。在哥倫比亞學院之內，大家都記得他是典型的好老師。范多倫在哥倫比亞學院待了將近四十年，他讓每一代的青年學子瞭解西方文學，同時也是受到學生與同事所信賴的朋友與顧問。

范多倫生於伊利諾州希望市(Hope)，他來到哥倫比亞學院的時候，哥倫比亞學院正在進行戰後的課程重整。一九二〇年代早期，有一群講授艾爾斯金「榮譽學程」的年輕學者，范多倫就是其中一位核心人物。幾年之後，范多倫成為教授，他引領一個重要的「人文學科 A」計畫委員會。爾後，他也在「人文學科 A」的發展時期主持這項課程計畫，還講授這門課程長達十七年之久，從未間斷。此外，他也表示，講授「人文學科 A」的期間，是他與大學生相處最愉快的一段時光。他的其他課程也同樣著名，例如：有關詩、莎士比亞與塞萬提斯(Cervantes)的課程。

一九三〇年代，范多倫與哥倫比亞學院以前的同事阿德勒(Mortimer Adler)，一同在安納波里斯(Annapolis)的聖約翰學院(St. John's College)設立經典讀物課程，並經常擔任此一課程的客座教授。范多倫於一九五九年從哥倫比

²⁹ 引自 Buchler, "Reconstruction," p. 121.